

以水为镜，观照文明流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杨志勇

生活在2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旅行家帕萨尼亚斯宣称，如果一个城市没有景观喷泉，就没有权利被称为城市。这足以说明水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国家或城市无法在未征服水的情况下生存。水，人须臾不可离。

大禹治水的传说，本质上也是水与人的关系写照。洪水不治，人就难以生存，而治水作为社会行为，推动人类形成新的自然与社会，促进国家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但水与社会的历史，并非简单的人征服水的故事。智慧的中国古人早已注意到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道法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等理念，都是这种关系的生动描述。挪威卑尔根大学地理学教授特杰·特维特的《水文明史：流淌的世界与人类的命运》（以下简称《水文明史》），构建了分析水与社会关系的新范式，为我们理解社会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

《水文明史》从水的视角，解释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及不同国家的发展差异。工业革命发源于英国，核心原因之一是英国可供交通运输利用的河流，水运基础设施为工业发展所需资源材料的低成本运输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并非所有有河流就具备交通运输优势，河的速度、水位高度、水位的年度和季节性变化以及淤泥沉积负荷，直接决定运输成本、货物装卸次数、运输系统规律性及

全年运能，只有符合低成本运输条件的河流，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河流改造和运河开凿、维护，不仅受水景影响，还受河流用水各方的政治关系及水的主流观念影响。中世纪陆运成本可能是水运成本的10倍，而英国疏浚河道、加固河堤、截弯取直及控制水位，比中国、印度、法国等国家更为容易。此外，英国的河流系统和降水模式本就适合运输，18世纪50年代之前，英国水运主要依靠天然水路。

大江大河的水利工程贯穿中国历史，这些工程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军事和行政目标，具备相对先进的多功能用途。《水文明史》肯定中国具备修建运河的技术能力，17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就是明证。

英国的优势不仅在于水运，还体现在水为工业革命提供动力。工业革命初期，纺织业、冶金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水车提供动力。水车技术源于亚洲，很可能由中国或印度发明，但为何能在英国生根发芽，中国却未能借助这一技术实现纺织业现代化？《水文明史》通过水一系统关系整合分析给出答案：中国多数河流流量极其多变，最重要的河流位于人口稠密的棉花工业地区，横贯平坦的洪泛平原，建库筑坝、调控水景难度大，且建成的水库不久就会被淤泥填满，导致工厂无法获得足够规律的水力供应，难以向以机械为主的现代化工厂转型。印度的极端季风模

式也不利于水力利用，对其核心经济区的水利机械化造成不利影响。《水文明史》由此对欧洲和亚洲发展路径“大分流”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

《水文明史》提出，研究水与社会循环的观念基础是“作为自然的一份，水的存在和变化都是自发的，也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并在许多方面和社会相互作用”。这种研究需要整合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探究水、技术、思想、结构和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单一学科无法完成。该书对挪威和埃及两国的分析，提供了水一系统分析的范例。挪威水资源丰富，成千上万的河湖构成独一无二的“黄金国”；埃及严重缺水，近97%的国土为沙漠，本国几无降水，用水完全依靠一条由上游国家降水补给的河流。

挪威年降水量约1500毫米，降水量过多深刻影响农业发展，其早期农业聚居点优先选择易排水区域，富裕农民占据山坡农场，穷人耕种易涝洼地。排水活动多由个体农民自主组织，无须集中管理，这催生并强化了挪威农业社会的私有制与平等主义结构。19世纪新排水技术和机械化提升了涝地生产力，扭转了农村不平等加剧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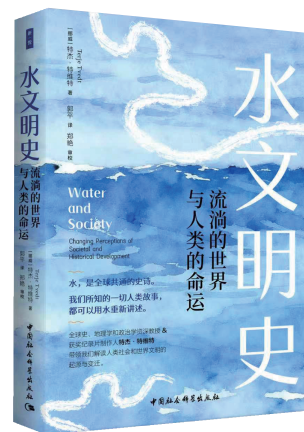
埃及农业奇迹的核心是尼罗河及其规律性洪水，埃及人通过漫灌、梯田灌溉等技术利用水资源，尼罗河的肥沃淤泥和

季节性流量造就了高产农业，孕育了大量农业剩余，为文明发展、国家及城市形成奠定了基础。

《水文明史》还解释了两国的工业化差异。水能是挪威的“白色煤炭”，作为干燥之国，挪威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因水电实现电气化的国家，如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生产国之一。廉价水电创造了公共财富，让挪威在吸引外商投资重工业方面具备优势，使其在世界市场获得相对优势。而埃及几乎没有可安放水力驱动水车的地方，水能缺乏严重阻碍了其工业化进程。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水的不确定性为标志的时代，了解社会和水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水在社会中的复杂作用及在自然界与人类世界之间的关联，已远超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

德国哲学家尼采将世界描述为“一个流动之水构成的不稳定基础”，强调寻找不变真理徒劳无益。但矛盾的是，水绝对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其不断变化对社会发展和多样性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我们的世界正是在这一永恒却多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水文明史》视野开阔，整合了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关注点，增强了对社会发展的解释能力。这块“铺路石”，无疑能为我们观察水与社会的关系、理解世界的过去与现在、展望未来，提供更多有益的帮助。



《水文明史：流淌的世界与人类的命运》
[挪威]特杰·特维特 著
郭平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百岁人眼中的百年之变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冯绍雷

面对当今世界的动荡激变，人们怀揣“何以至此”的发问，期盼先人的历史经验能够指点迷津。于是，两位百岁老人的著述，常不由自主地映入笔者眼帘。一位是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1923—2023）；另一位虽名气稍逊，却深深影响了二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他就是美国战略思想家、外交家、历史学家乔治·凯南（1904—2005）。

百岁老人眼中的百年之变，较一般人更具沧桑感。若其人所处时代大体同步于当代百年巨变，又以传世著述、亲身经历重大历史进程而闻名，更是凤毛麟角。在西方世界，同时满足“百岁人瑞、顶级专业人士、时代历史转折的重要推动者”这三个条件的，寥寥无几，亨利·基辛格与乔治·凯南当属其中。

基辛格著作等身，更因20世纪70年代初推动中美关系破冰等历史进程，在国际关系史上留下盛名。比基辛格年轻一岁的乔治·凯南，虽位阶不及基辛格显赫，著述流传也不广泛，却作为“遏制”战略的提出者，被视为“冷战斗士”和冷战格局的主要思想奠基者。事实上，在凯南其更漫长的人生中，他因成为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及冷战后美国全球扩张战略的重要批评者之一，同样载入史册。

基辛格与凯南这两位政治精英在维护文明传统、关注国家战略利益的同时，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对外战略实践作出了深刻反思，也留下了寻求和平、避免战乱的历史印痕。

“维护者”与“反思者”的双重形象，同时出现在两人身上并不奇怪。有关他们的传记作品中，呈现的往往不是单一的形象，而是多个截然不同的基辛格与凯南。比如，基辛格通常被评述为“现实主义”者，超越制度与价值差异，关注权力均衡与稳定；但尼尔·弗格森在《基辛格传》中，却为他挂上了“理想主义者”的桂冠。约10年前，笔者曾当面请教弗格森：为何称基辛格为“理想主义者”？他答道：这是一生经历、专业锤炼、职业磨砺及时代召唤使然，因此基辛格既是老练的现实主义者，又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

与基辛格久居高位不同，凯南早年在美国外交界步步晋升，从国务院规划处创设负责人，直至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20世纪40年代末，凯南成为美国对苏战略制定的核心人物，后又担任总统对苏事务顾问，一度才华横溢、备受推崇。美国冷战史研究权威加迪斯，1981年曾受凯南委托撰写传记，并获准查阅其日记、信件、文稿等所有海量文献。然而，加迪斯2011年出版的《凯南传》，大体侧重凯南如何提出“遏制”战略，对他在冷战格局形成后，批评美国将“遏制”拓展为全面争霸、拉拢西方阵营对抗苏联、加剧世界战争风险的重要立场，却几乎避而不谈。以加迪斯的权威史家眼光，未必不知晓凯南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思想转变，究其原因，恐是彼时语境所限。

有幸的是，近年来中文学术出版社通过《凯南日记》等作品，开始披露“另一个凯南”

的反思者形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弗兰克·科斯蒂廖拉所著的《乔治·凯南：两个世界的人生》，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更为丰富、立体的凯南：20世纪40年代末这位美国外交界明星，在提出对苏“遏制”概念半年后，便转而反对美苏全面对抗。他赞同深谙罗马帝国衰亡缘由的吉本的观点，反对帝国过度扩张，认为这势必引发国内体制动荡。凯南转入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后，通过对法俄关系的系统研究，剖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层原因。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为表彰其“历史贡献”建立“凯南研究所”，但凯南依然毫不留情地批评从伊拉克战争到北约东扩的美国外交战略，直至本世纪初去世。

“两个凯南”与“两个基辛格”的故事，揭示的远不只是历史学家的笔墨之争，更告诉人们：即使是冷战，也并非注定如此，那段历史充满了遗憾。诚如科斯蒂廖拉在序言中所说：“冷战是一个对话和外交皆有可能的时代，并不只是我们看到的那些不可避免的对峙和危机。”洞观百年巨变，即便在看似不可更改的历史逻辑之下，依然留存着人可以有作为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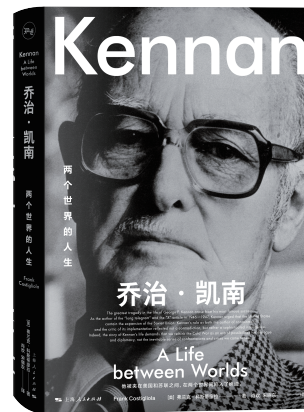
但当我们言说“事在人为”的可能性时，问题远未终结。科斯蒂廖拉的《乔治·凯南：两个世界的人生》颇为可贵之处在于：其一，点出了历史进程中阴差阳错、失之交臂的关键时机所起到的作用。书中记载，1952年凯南满怀雄心以大使身份重回苏联，试图推动美苏

缓和，此时斯大林也表达了和平期待。遗憾的是，美国国内已时过境迁，全然没有了罗斯福时期对苏和解合作的意愿，反而一心拉帮结派、全面抗衡，二战后实现缓和的宝贵机会稍纵即逝。可见，事在人为，更需抓住恰当时机。

其二，该书并非简单记录人生，而是对凯南身处多重世界中的复杂人生作了全息照相式描述：既呈现他对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式高压闭锁的不满，也展现他对俄罗斯文化的深切热爱；将其坎坷一生置于外交博弈、国内官僚体系挤压等多重风云中对照；将他信奉的弗洛伊德“恋情”与“文明”抗争之说，移情于对俄苏问题的诠释；尤其披露了他作为外交官的官方立场，与基于个人保守主义原则对美国国内现象批评之间的张力。尽管如何将各类史实与思想心理分析融汇一体仍需进一步研究，但书中这种留下叙事缺口的处理，反而彰显了凯南个人与时代巨变的微妙互动，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都为读者思考百年巨变中的人性变幻留下了空间。

凯南自己也曾坦陈，即便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看似明晰的“遏制”思想，迎来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依然心存疑虑，“赞美并不能完全消除自我怀疑”“我所知道的不过是零零碎碎的东西，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认识”。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也都有它的沉思和遗憾。人们期待当代传记作家能奉献更多带有时代印痕、兼具个体灵性的优秀作品。



《乔治·凯南：两个世界的人生》
[美]弗兰克·科斯蒂廖拉 著
肖欢 宋晓东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乱世藏辉：重识五代十国的文明价值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谢宇荣

在中华历史叙事中，五代十国长期被贴上“乱世”标签，是夹在唐宋之间的、长期被简化乃至忽视的历史片段。自欧阳修提出“五代十国”概念以来，人们对这段仅53年（907年—960年）分裂时期的普遍认知，仍多停留在政权更迭频繁、战火连绵不绝、民生凋敝困顿的粗糙印象层面。然而，这样的认知，终究难以完整解释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在“乱与变”交织中的深层转型。

陕西师范大学社文王教授积数年研究之功，推出《五代十国史》。该书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桎梏，还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多元政治格局，并系统梳理了典章制度的演变轨迹。凭借深刻的史学洞见，作者再度审视了这段“承唐启宋”时期的历史价值，为澄清唐宋变革的内在逻辑提供了一部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大众普及性的权威范本。

长期以来，史学界书写五代十国史，多遵循北宋欧阳修所倡导的“正统史观”，以中原政权为核心，并将“十国”纳入其叙事框架加以论述。十国及边疆政权被视为“僭伪”或附属，导致叙事带有明显的偏向性：中原政权的更迭被重点探讨，而传统概念中“十国”的发展常被轻描淡写，归义军、定难军、秦岐政权、大理国等割据势力更是被排除在独立叙事框架之外，沦为历史“边角料”。

这种叙事模式不仅简化了当时多元并立的政治现实，更弱化了乱世之中区域发展的积极面向。《五代十国史》的突破，首先在于打破了学界以往研究中内容零散、偏重专题的局限，把那些在历史进程中举足轻重的

边疆诸政权与藩镇都纳入观察范畴，构建起南北与边疆势力之间或共生、或对峙、或交融的全景式动态格局。

全书前三章聚焦政权演变，清晰梳理了自唐末藩镇混战至政权更迭、并立的历史脉络。正如社文王教授多次强调，五代十国时期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分裂时期，是因为自后梁建立起便已出现统一趋势，这种统一是中原局部统一与十国区域内统一的双重进程。因此，该书将各政权均视为独立的历史主体，以其存续时间为断限，还原它们在乱世中求生存、谋发展的努力与成效，打破了其依附于中原五朝的叙事偏见。

在叙事视角上，全书旨在传递出对“乱世”“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等历史标签的再审视。“乱世”一直是社会对这一时期的刻板印象，传统史书多聚焦于权力争夺的残酷性和“武夫当国”的特殊性。对此，社文王教授既回避动荡的现实，更以较多笔墨阐述了“乱中有变”所蕴含的积极意义。比如，后唐明宗在位时，因推行良政，被清代顾炎武评价其统治为“五代中号为小康之世”。后晋高祖虽有割让燕云十六州换取契丹支持之举，但亦推行了一系列务实政策。后周两位君主则致力于统一、做出改革。南方诸国虽割据一方，却普遍实现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区域秩序。

这种立体全面的叙事方式，将“五代十国”从“动荡混乱”的单薄标签中剥离，推动读者跳出固有认知桎梏，看清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传统文献中，对五代十国典章制度的记载或散佚不全，或过于简略，这是长期以来该时期断代史著作中对此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的主因。这也使得大众认知中“宋承唐制”“承唐启宋”“唐宋变革”等概念愈发笼统模糊，仿佛五代十国这一时期并未真正参与到这一历史脉络之中。

社文王教授前期所著《五代十国制度研究》，是《五代十国史》首次将典章制度纳入断代史书写的理论基础。该书涵盖了科举与职官、军事、教育与法律等制度体系。

以枢密院与枢密使为例，枢密使虽源起唐代，初由宦官充任，但五代时期逐步完善，枢密院已然蜕变为统揽人事、财政、军事大权的机构，这一转变后又为宋代继承并继续运作演变。殿阁之制亦是如此，其肇始于唐，发展完善于五代，殿阁学士成为皇帝机要顾问；两宋及元明清诸朝持续发展，致其成为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中对当时法律制度与军事制度，尤其是各政权兵制的梳理，同样彰显了该书的学术广度和深度。五代禁军之制最为复杂，各朝制度多有更迭，军号也不尽相同。从早期的“牙兵”到“侍卫亲军”“殿前军”，再到“控鹤”“护圣”诸军号，无不体现着军事权力结构的动态调整与制度化演进。周世宗对军队的整顿与改革，更是成为宋初军制的重要蓝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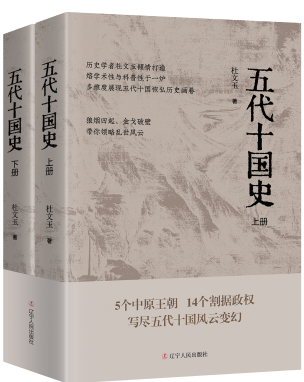
凡此种种，均是五代十国作为“承唐启宋”关键过渡时期，乃至“宋承五代之制”观点的有力印证。诸多实证，也有力驳斥了类

似“五代典章制度无可取之处”的陈旧偏见。“大一统”史观叙事对历史分裂时期所持有的固有偏见，长期制约着公众对五代十国历史价值的全面认知。然而，社文王教授在著述中注入的历史关怀，促使我们无法再对乱世之中文明的传承视而不见。

在经济领域，该书同样对“乱世经济停滞或倒退”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以南方诸国为代表的区域政权，有其经济发展的独特轨迹与显著成就。通过系统考察当时农业技术的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商业市镇的兴起以及海外贸易的拓展等方面，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古代南北经济格局重塑的关键阶段。

在文化传承与士人精神层面，这一时期亦非文明断层期。尽管门阀士族消亡，武夫执政，文士处境维艰，但他们并未放弃文化坚守与传承的使命，将中原文化融入南方地域文化之中，从而推动了南方地区文学、艺术和教育水平的显著提升。词的兴起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书院教育的重视，为宋代书院制度的勃兴埋下了伏笔；南唐、闽国等政权在延揽文士方面尤为积极，为宋代文教事业的发展积累了重要人才资源与制度经验；后蜀、南唐所设画院培养出的杰出画家，如黄筌、徐熙等，亦为宋代文人画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总的来说，这部著作不仅凭借翔实的史料梳理与宏阔的史识格局，为“乱世”与“分裂期”的断代史研究提供了新范式，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包容性，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五代十国史》
社文王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解

放

书

单